

“杨百万”传奇落幕

本报记者 李 景

在中国股市1.8亿投资者中,杨怀定应该是资格最老的那一拨。上世纪90年代,在那个“万元户”稀缺的年代,杨怀定通过证券交易成了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成为借助资本市场红利最先富起来的那批人。

股票,贯穿他的一生,也造就了中国股市个人投资史上的一段佳话。

而今,71岁的杨怀定与世长辞,除了留下一段股海沉浮的传奇人生,“杨百万”的生命轨迹也成为观察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窗口。通过这位“中国第一股民”的“发家史”,我们得以窥见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路径。

看报纸赚来“第一桶金”

杨怀定,人称“杨百万”,是中国股市历史上绕不开的标志性人物。他祖籍江苏镇江,原是上海铁合金厂职工,在外人眼中,他工作稳定、家庭幸福,但每天一杯茶、一张报纸,守着仓库的安逸生活并不能让他满足,骨子里不甘平凡的杨怀定最终决定走出“舒适圈”。

1988年,这个每月拿着41元固定工资的上海人,决心扔掉“铁饭碗”下海,并向单位递交了辞呈。当时,在一片不被看好的舆论环境下,杨怀定揣着2万元积蓄,开启了资本市场的投资生涯。

“辞职以后,我订了很多报纸。在众多资讯中,我看到报纸上刊登了我国1988年4月21日开放国债市场的消息,我感觉机会来了。”杨怀定说,当时发行国库券,目的是向社会募集资金,支持国家建设,他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投资机会。

杨怀定的判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1985年期的国库券开盘价104元,利率15%。杨怀定的2万元如果全部用来买国库券,一年利息是3000元。如果存银行,按利率5.4%算,一年利息仅1080元。购买国库券显然更划算。于是,他决定把2万元全部投资国库券。由于国库券账面价格有涨有跌,上午买进后杨怀定心里忐忑,下午就迫不及待去交易所看行情,发现涨到了112元,他赶紧卖出,赚的800多元钱相当于当时他两年的工资。

“只要有价格差,那么就存在套利空间。”头脑灵活的杨怀定看到机会,又开始看报纸了。在信息流通并不发达的年代,各地党报是披露各地国库券价格的重要渠道,杨怀定在报纸上发现,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一些开放国库券买卖的试点城市银行为了周转资金,会以低于面值100元的价格出售国库券,造成了不少地方的国库券价格存在异地价差。于是,他开始频繁辗转各大城市,进行国库券的收购和转卖,低吸高抛。一年过去,杨怀定赚到了令人瞠目的100多万元。然而,拿着人生的“第一桶金”,他却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个赛场。

审时度势成就“第一股民”

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但当时上海的股票市场非常低迷,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个新兴市场能掀起什么风浪。但杨怀定

不一样,他不仅看好股市,而且还带着刚赚来的“第一桶金”跑步入场了。

“在早期的股市发展中,‘杨百万’这样的个人投资者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榜样作用。”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副院长高华声表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敢吃螃蟹的先行者,我国股市才能蓬勃发展,逐渐壮大。

对于当年的入市,杨怀定也是满怀自豪。“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的第一天,我一个人独揽了交易量的一半,引起了轰动。”杨怀定总跟身边的人说,跟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走,总会有收获,国家设立证券交易所,自己没有理由不参与。

后来的故事成了股市中一段传奇。杨怀定来到上海静安区某证券门市部询问交易员:“现在还剩多少种股票,多少数量是待售的?我全要了!”最终,杨怀定买了2000股面值100元的股票“电真空”。半年后,该股票大涨,杨怀定在800元抛售,净赚150多万元,“杨百万”彻底出名了,“中国第一股民”的名号也传开了。

对于杨怀定的成功,有人说他运气好,有人说他有内幕消息。但实际上,杨怀定正是当时我国早期优秀股民的缩影,他们认真对待投资,善于捕捉政策重点,勇于逆流而上,更懂得急流勇退。通过对政策的研判,发现货币投放变化,通过对经济周期的判断,把握发展趋势,在审时度势进退有据中,他们的故事也成了我国股市最好的宣传片。

杨怀定的成功绝非偶然。他刚入市时便跟交易员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此前从国债交易中获利颇丰,但他从报纸上看新闻得出结论,国债利率要调低了,还是应该买点股票。事实也证明,不久后的国债利率果然下调了,股市迎来大发展,他的“知行合一”又让他完成了一次财富飞跃。

杨怀定难道没有投资失败过?当然有。1992年,我国资本市场遭遇自开市以来的最大熊市。上证指数跌至400多点,杨怀定入场抄底,结果股指继续跌至300点左右,“股神”也被套牢了。但到了1994年,他又在报纸上敏锐觉察到政府即将出台救市政策,便立刻将股票账户中所有资金投入股市,此后证监会真的宣布了救市政策,股市从300多点暴涨至1500点,杨怀定对中国股市的耐心和信心让他又一次获得了丰收。

从“杨百万”身上能学什么

纵观杨怀定的投资生涯,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优良品质在他身上得以充分体现。就在买卖国库券获利不久,因为害怕被扣上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的帽子,杨怀定失眠了。冷静下来后,他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另一个是上海市税务局,询问自己的操作是否合法,是否需要纳税。

好在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根据相关条例告诉杨怀定,国库券是免税的,据此认为他不需要为买卖国库券的收入缴税,同时还表扬了他主动报税的行为。经过此事,杨怀定



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中,李俊华(前中)与学生们一起研讨科研项目。(资料照片)

来到位于北京的启迪科技大厦的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李俊华在26层的落地窗前驻足片刻。从这里可以远眺玉泉山、昆明湖,但人眼的不是山光水色,而是大气环境的质感。“要是在这儿架上相机,每天拍一张,可以当资料留存。”李俊华说。

说话三句不离本行的李俊华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除了烟气多污染物控制技术与装备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的身份外,这位国内大气污染控制研究领域的专家还有另一个身份——江苏中创清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离开家乡30多年,李俊华仍说着一口地道

的河南林州话。“从2013年开始,雾霾治理成为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的头等大事。”当年,一次重污染曾让PM_{2.5}监测指标几度爆表。而此后,科技进步成为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的主要推手。中国工程院的综合评估显示,对打赢蓝天保卫战、改善PM_{2.5},功劳最大的是包括钢铁、水泥、玻璃、陶瓷等传统高污染工业企业的非电行业提标改造。而李俊华团队潜心研究的“工业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深度治理”技术及应用,正是工业减排的关键技术。

李俊华从事大气污染治理研究已有20年。“我主要研究脱硝,也就是氮氧化物控制。目前,

才敢放心施展拳脚。

“‘杨百万’是个普通人,也是全国数百万股民的其中之一。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坚持散户定位,为引导资本市场发展站岗放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长盘和林表示,像杨怀定一样坚持以勤奋学习来实现投资收益,并始终伴随股市一起成长,坚持传播股市正能量的老股民,是我国股市发展中的财富。

“‘杨百万’也是我国散户的缩影,他代表着散户群体正在成长为职业化、专业化和理性的投资者。”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表示,他从杨怀定身上看到了散户等投资者共同推动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不断成长成熟的过程,看到了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和法律不断完善,市场运行更加规范有

效,市场广度深度不断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

“‘杨百万’也代表了中国第一批股市投资人用资本增值致富的先锋典范。”高华声表示,随着中国居民财富的积累,资本收入将成为中国居民重要的收入来源,杨怀定的故事为投资资本市场作出表率,那就是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同时让更多参与者意识到风险和收益间的正确关系。

30余年资本市场发展的潮起潮落,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随着我国股市更趋向法治化、规范化,这个时代仍然会出现很多机会,愿每个在资本市场打拼的投资者都能像杨怀定一样,既能找到那把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的钥匙,又能谱写出一段精彩的投资人生。



2007年,杨怀定在广州参加活动时登台演讲。

(视觉中国)



1990年12月19日,在上海提篮桥城市信用社,证券交易所第37号经纪人开始营业。种 楠摄(中经视觉)

感言

在中国股市30余载的激荡岁月中,“杨百万”是一个代表,也是一个榜样。他的传奇故事激励着一代代勇敢的投资者追逐财富梦想、投身证券市场;他的成功经历更折射出中国股民群体无惧挑战、敢于开拓的成长历程。

“杨百万”的出现,让个人投资者有了投身资本市场的勇气。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初创年代,很少有人看好新兴市场,更少有人敢于投资新兴市场。但杨怀定凭借他的勤奋、坚持和眼光,从股市中收获了投资回报,让更多人看到了资本市场的力量。

“杨百万”的成长,展现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桥头堡的城市基因。上海人对经济发展的敏感、对投资理财的精明、对事事考虑周全的性格,在杨怀定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从害怕谈论股票、厌恶投资风险,到股票、基金走进千家万户,杨怀定用一个成功的投资案例,唤醒了上海人的金融意识。

当前,A股市场已经逐渐由散户市场向机构投资者市场转变,从“散户市”走向“机构市”也是市场逐步成熟的必经之路。与机构相比,散户的专业知识以及风险抵御能力明显不足,我们要让更多的专业机构成为投资主流,从而达到保护散户的目的,维护稳定投资秩序。

“杨百万”是传说中的“股神”,“杨百万”更是我们投资者自己。他30余年坚定不移的投资生涯,也是无数在经济发展大潮中打拼的普通人的真实写照,更映射了中国资本市场从诞生到壮大的全过程。中国股市从此再无“杨百万”,但市场上仍将流传着他的传说。

李 景

这个传说仍将流传

本版编辑 王 琳 周颖一 张苇杭

大气污染控制研究领域专家李俊华——

用技术创新推动工业减排

本报记者 杨学聪

我们进行的多污染物协同深度治理,除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减排,还涉及重金属等非常规污染物的深度治理。”李俊华说。

我国的工业烟气治理难在哪?“2013年以前,我国工业排放标准与国外相当。但人家是零星几个烟囱,咱们是成千上万的炉窑。”李俊华告诉记者,与国外相比,我国燃煤电厂产生的颗粒物种类复杂、浓度高,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减排,必须达到更严苛的标准——超低排放。要实现这个目标,只能自力更生。

最先进入视野的是燃煤电厂的烟气治理。“十一五”期间,清华大学联合国内电、中电投等国企,在二氧化硫治理取得明显进展的基础上,又采用“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治理电力行业的氮氧化物排放。2010年前后,随着复合载体、催化剂制备及再生实现100%国产化,烟气脱硝催化剂在电力行业全面铺开。

迈过电厂烟气治理这道坎儿,李俊华团队将攻关的重点转向非电力行业300℃以下中低温烟气的脱硝技术。包括钢铁、有色、水泥在内的行业同样被视为烟气污染大户,由于其生产采用的原料更多样、燃烧工况更复杂,由此产生的工业废气的成分也更繁杂。要在排放前将中低温烟气中混杂的各种污染物都留下来,堪称世界性难题。

2016年10月,清华大学联合国内科研单位及各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创建了烟气多污染物控制技术与装备国家工程实验室。面向钢铁、冶金、建材、石油化工、电力等行业,构建烟气多污染物治理技术与装备工程化研究的创新平台,系统研发工业烟气治理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材料、核心装备、先进技术和工艺。

“只有所有行业都大幅减排,蓝天才能常驻。”李俊华说,他们要做的就是针对电力、钢铁、水泥、玻璃、陶瓷、石油化工等行业不同的烟气特征,量身打造不同的技术路线:对350℃以上的高温烟气,采取高温脱硫酸脱硝催化剂治理;150℃至300℃的中低温烟气,采取中低温催化剂,去除氮氧化物等非常规污染物;150℃以下,则采用碳基功能材料吸附、再生、转化,实现多污染物协同治理。

当然,要将实验室中经过小试、中试证明有效的技术真正用到工业烟气治理中,示范工程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时至今日,李俊华仍对宝钢集团2016年投建的600平方米烧结机烟气污染物深度减排示范项目印象深刻。“这个项目在宝钢集团内放了一颗‘卫星’。”

此前钢铁企业对能否实现超低排放存疑,且技术改造投入不菲。当创新技术真正在钢铁流程中顺利运转,对我国的钢铁行业减排意义重大。

有了成功的技术路线和示范项目,在钢铁行业推行超低排放才成为可能。2019年,我国明确提出钢铁超低排放总体目标:到2025年,全国所有具备改造条件的钢铁企业力争实现超低排放,达到80%左右。

技术转化离不开产业化的支撑。依托李俊华团队的创新治理技术,清华控股投资孵化了江苏中创清源科技有限公司。由该企业参建大气污染控制技术成果转化的创新平台,以解决行业痛点、难点为导向,为技术成果转化提供产业化支撑。更为这家企业的首席科学家,也让李俊华的研究更贴近市场,实用性更强。

如今,李俊华又有了新目标:“目前国内二氧化硫减排60%以上,氮氧化物治理取得明显进展,挥发性有机物总量居高不下。我们现在关注PM_{2.5}和臭氧这两个大气二次污染物。”想控制大气中的二次污染物,最终还是要落在工业企业的减排上。“我们以发挥挥发性有机物治理为抓手,加大氮氧化物和VOC的协同减排力度。”

“现在大气环境治理已经进入深水区。”对于未来,李俊华还有更多期待。“我国的目标是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在空气质量改善的同时实现温室气体减排,一是少用化石燃料,二是把产生的二氧化碳捕集后再利用,这在将来也是很难的一个方向。”